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〇八期 ——
(二〇〇二年十月七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0210a)

【研究动态】《王申酉文集》编后记	丁 东
【亡灵祭坛】《王申酉文集》序：十年生死祭	金 凤
【史海钩沉】血写的嘱托——王申酉和他的《供词》(上)	金 凤
编者小启：本期稿挤，周孜仁著“红卫兵小报和我”暂停连载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动态】

《王申酉文集》编后记

• 丁 东 •

(一)

大约十年前，我开始研究文革时期的民间思想。1996年，是文革30周年。《东方》杂志的朱正琳、梁晓燕要组织一个“文革30年祭”的研究专题，我与谢泳合作了一篇论文《文革时期的民间思想概观》。《东方》总编辑钟沛璋先生读后说，文章不错，可惜忽略了王申酉。

《东方》这组文章没有发出来。但从此，我就开始留意王申酉。到了1988年冬天，我请邵燕祥先生为《孙越生文集》作序，又提起王申酉的事。他说，可以找金凤。并且当下拿出一本杂志，上有一篇访问金凤的文章。其中提到，有关王申酉的书出不来，成为金凤的一块心病。

终于，我在北京空军干休所找到了早已离休的资深记者金凤；终于，我读到了王申酉的遗作。

1998年，中国大陆的文化气氛较为宽松。我马上向一个书商推荐了这部书稿，他也与一家出版社说好，来年春天推出此书。钟沛璋先生还赶写了一篇序言。

然而，正当此书发排之际，大陆的气氛却紧张起来，不时听说有出版社吃了红牌，停业整顿。这样，原来已经审查通过的那家出版社也收回了成命。此书搁浅，金凤先生十分失望。

其后的三四年间，我先后将这部书稿送到四家中国大陆的出版社，编辑们看了都说价值很高，但又都说现在不好出，还得等一等。

我也不能消极等待。于是继续搜集有关的资料。经钟沛璋先生介绍，我找到上海华东师大前党委书记施平家，他的夫人将施先生回忆录中记述王申酉平反经过的文字给了我，让我编入此书。

我写了一篇《寻找王申酉》的短文，引起上海新闻工作者顾训中先生的注意，他帮我与王申酉的弟弟王解平取得了联系。

居美国的学者宋永毅先生也是一位研究中国文革民间思想的专家，他从我处将王申酉的遗作拿去译成了英文。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的刘青峰女士经宋永毅推荐，也很重视王申酉的价值，与我联系，将王申酉的遗作的片断和相关评论文字发表于该刊的电子版。

直到今年，香港高文出版社终于决定出版社《王申酉文集》，这位杰出的思想先驱留下的遗著终于得以面世。

（二）

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思想最为禁锢的年代，也是独立的思想者从民间滋生的年代。思想理论界的知识者从整体上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的思想便从思想理论界以外产生。在那个年代迸发出独立思想火花的，大部份出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头脑。王申酉文革前在华东师大读书，就受到政治迫害，这成为他比同代人更早醒悟的精神动力。于是，他的思想比常人早想了一二十年——

他批评“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是1963年；

他批评思想独裁是1964年；

他批评“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是1965年；

他批评“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是1966年；

他指出“毛在十年前划了三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真志士”是1967年；

在他1976年11月18日到23日写的“供词”里，他全面地反思了建国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他的观点，不过是写在日记中，写在给女友的书信里。他没有结社，也没有把他的主张付诸政治活动，仅仅因为思想，因为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与当时统治者不一致的思想，仅仅因为他比领导人更早地提出了有利于中国繁荣进步的思想，于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让我们记住王申酉被枪杀的日子吧：1977年4月27日。这个日子和遇罗克被枪杀的日子——1970年3月5日一样，都铭刻着国家机器的耻辱。苏格拉底被杀死在2400前；布鲁诺被烧死是在400年前；而中国杀死自己的思想家是20世纪70年代。遇罗克活了27岁！王申酉只活了31岁！中国人不是天生没有思想能力，而是最杰出的思想者被推上了断头台！

王申酉在80年代初平反时，首都的一些新闻机构组织金凤等一流记者，花了很大的气力去采访，准备像宣传张志新、遇罗克一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王申酉的事迹。然而，报导写成之后，有关领导人却提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藏是藏起来了，一藏就是将近20年，文稿在金凤手里已经藏得发黄发脆。传之后世，就不好说了。中国年青的一代，多多少少还知道有一个张志新，有一个遇罗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悲剧，总算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的教训。但王申酉是谁，不但后人不知道，就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知识界也很少知道。如果这样，他的血岂不是白流了么？

（三）

今天，王申酉的遗作得以面世，我还想说明的是，王申酉的悲剧不是孤立的。还有人比他更为不幸。王申酉毕竟在拨乱反正的年代获得了彻底的平反，还有一些思想者连这一点历史的安慰都没有得到。

举一个例子：

湖南湘西溆浦人低庄公社杨和坪大队小学教师武文俊，1976年投书国务院总理，提出了“重新建党建国建军十大纲领”。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现在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奴隶主义，才是真正的复辟倒退。

二、煽动鼓励人民之间斗争，说是阶段斗争，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它的奴隶主义制度。

三、国家应为社会契约产物，国家机构设中央、省（市）、县、乡、里等级，国家应民主产生，为全国大多数人服务（为勤劳、正直、善良的老百姓服务），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员，应由人民逐级普选产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每四年一改选，连选可以连任，但最多只能连任三届（即12年）。国家政策由人民讨论制订，逐级汇总上报中央，最后颁布确定。

四、建立一定军队，防御外敌侵略，建立少量地方治安，解决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军人来源由基层人民选送，服役期三年。愿继续服役者，根据情况加级加薪。

五、提倡言论、学术、出版自由，人民可以登报批评政府，提出建议，奖励科技和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材。

六、发展工农业生产。

七、财产问题，凡国有企业、工厂等仍为国家所有，集体财产仍为集体所有，给予奖励，

不愿集体化者，由人民讨论，财产平均分配（但不予奖励），不许以强凌弱，侵犯他人财产和利益。

八、对原来干部、除少数确有作恶者外，其余一律不予追究。

九、国家征收的赋税，根据国家实际需要，稍有余地地来决定人民的负担（尽量精简机构、减轻负担）。

十、大赦天下，释放囚犯。

建国宗旨：创民主，除独裁，立自由，灭残暴，兴文明，破野蛮，建幸福，济贫穷，天下必群起而服之，定无反心。

武文俊的“匿名信”是1976年4月12日开始酝酿起草，4月22日写成的。4月24日从溆浦县城投邮。3个月后，即7月25日夜武文俊被捕。经过167天的审理，武文俊就被枪杀在县城对河的沙坑里，时年40岁。

他的亲人于3年后开始上诉，要求复查此案。1982年5月18日，怀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武文俊属“有罪错杀”。鉴于其家庭生活困难，特给予其家属生活补助费800元。这就是事件的结局了。

平心而论，武文俊的思想理论不如王申酉系统和深刻，但也有许多闪光之处。但他至今也没有获得彻底的昭雪。如果不是《湘声报》编辑向继东有意寻访，他已经被历史遗忘了。

王申酉、武文俊被杀害于1977年，无法归罪于四人帮，也无法归罪到毛泽东的名下。同年被判死刑的“思想犯”知名的还有李九莲、钟海源、史云峰，不知名的不知还有多少。当时我在山西生活，知道有一个“第四国际案”，为首的张敏、赵凤歧也被判了死刑。赶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高人民法院急令山西刀下留人，他们才幸免一死，获得平反。据说，当时省里一个领导干部，不是为自己没有成为千古罪人而庆幸，而是后悔动作太迟，程序不当，没有赶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之前把张、赵置于死地。以言致罪，因思想杀头的血腥传统，固然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但登峰造极则是公安六条。一大批“思想犯”被残酷杀害，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又一幕惨剧。有人也许说，这都是“两个凡是”的恶果。我觉得仅仅这样认识问题是不够的。在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意识到公民有批评领导人的权利，不能以言、以思想给人定罪的，并没有几个。杀害这些思想先驱，都是在各省市党委的常委会上讨论过的，讨论时不赞成杀人的极少，敢说他们无罪的则一个也没有。有没有思想自由，能不能保障公民思想无罪，是文明和野蛮分野的重要标志。以言致罪，因思想杀头的制度，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叫共和国也好，叫帝国也好，都是野蛮的制度。思想权利是天赋的权利，是每个公民与生俱有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直到在胡耀邦等人努力下，废除了思想犯的死刑，中国才算迈进政治文明的门槛。然而，古老的中国要想成为思想自由的沃土，中国公民要想充份行使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实现这个目标，也是王申酉留下的历史使命。

~~~~~

【亡灵祭坛】

《王申酉文集》序：十年生死祭

• 金 凤 •

王申酉同志，我尊敬地呼唤着你的名字。你当然是听不见的了。“同志”，这两个字，在你如囚徒般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度过那屈辱的痛苦的十年时间，仅仅一次，一位善良的中年女工曾经这样称呼你。你悚然动容，极为感动。当然，还有你的女友S．D．。她不仅把你当同志而且把她温柔、体贴的心献给你！当然，还有你年迈的双亲，他们怀着那么热烈的希望，期待着你们家中第一个大学生，将会带给他们晚年多少幸福与欢愉。不料却是漫长十年苦难的折磨，最后是那致命的一击！还有你的哥哥和弟弟，他们都是那么尊敬你、爱你。还有你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他们当然把你当作亲密的同志。可是，他们不敢公开这样称呼你。此外，茫茫大地，偌大中国，你就如孤雁似地，在万里长空独自沉思和高鸣……

十年前，你不幸离开你那么热爱的国土和人间。人们为你奔走，呼号，抗议，斗争，为你恢复和争取人的尊严和权利。“王申酉同志”这尊称，便不时挂在人们心上，挂在人们嘴里。

不少人看了你的狱中《供状》，理所当然要尊称你为同志。虽然，你也许生前便知道，可能从“文革”时期便开始，社会上流行的称呼是“师傅”。不管是对谁，对一位白发苍苍的教授，对一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对一位妙龄的少女……统统称之为“师傅”。“同志”，是五十年代的尊称。这个尊称如今好像不那么流行了。但是，你是很在乎，很重视它的。在你这样一个一直被当作所谓“反革命分子”对待的人身上，“同志”的称呼自有特殊的份量和涵意。可惜你现在是再也听不到了，尽管千千万万人都这样称呼你！

王申酉同志，你惨遭枪杀，血流大地，距今整整十年了。在你牺牲三年后，一九八〇年秋天，我匆匆赶到上海，和几位同行一起收集你的事迹，写出初稿，到现在也有七年了。岁月催人，岁月逼人。你已停留在永恒的彼岸，不会再留心勿勿逝去的时间。活着的人，却要计算，要争取最宝贵的时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和七年？七年前，我采访的笔记，你写的《亲笔供状》，你视为比生命还宝贵的日记和书信都在我手边，整整放了七年。我手中如捏着一团火，这火又慢慢燃烧开去，一直烧灼着我的心。我的心真如火烧着那么疼……

你我都是唯物主义者。我自然知道，你现在再也听不到，也看不到身后的一切。你活着时，能认识你该有多好。也许，我也只能随俗地默默地同情。也许，能躲在一角和你悄悄地深谈。可惜这些都做不到了。我所能做的，是把我们知道的你写出来，介绍给你如此热爱的年青的一代。

这也并不那么容易。我现在就来告诉你。我知道，王申酉同志，你是听不见的了。只是，你爱着的亲人，朋友和同时代人会看到和听到，这和你听到，应当也差不多。我这样安慰自己。生者和死者的对话，那传诵千古的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和苏东坡的《悼亡诗》，不都是流传下来，给千千万万后来人看的吗？在写的人感情上，首先是给留在记忆中的亲人和故人听的。我和你是同志，是朋友。生前虽不相识，这些年的文字交往，已使我在思想感情上居为你的朋友和同志。我禁不住要告诉你，关于你、围绕着你身后发生的事情。你活着的时是那么“卑微”，被人像草芥般任意践踏，像牲畜般随便宰割，如尘埃似地被随意忽视。你永远不会想到，也不会知道，在你身后，引起那么多喧嚣，那么多人注意。包括许多大人物，甚至有人还为你掉下忏悔之泪哩！这些，我都要一一告诉你。

那是一九八〇年秋天，人民日报两位副总编辑，给我布置一个紧急任务，要我赶到上海，去采写一位“张志新式”的人物。张志新，你也许不知道，哦，你肯定不知道。那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和你一样，她对“横扫一切”的“文革”不满，敢于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她的命运和你一样，只是早在你之前，在“文革”中便惨遭杀害。比你幸运的是，粉碎“四人帮”后，她的事迹公布于世，引起千万人的崇敬。现在，人们发现了你，要把你当成第二个“张志

新”。我知道，逝者已矣，来者可追，采写你的事迹，至少给活着的人，留下一份血的教训和珍贵的思想遗产。

我急急乘飞机飞往上海。上海几家报纸、电台和新华社分社，已组成“联合调查组”。我参加进去，大家立即开始紧张的采访。

我们赶到你当初怀着极其自豪的心情考进的华东师范大学，找了校党委书记，多次监管你的保卫工作干部，还有一些老师和同学，初步了解一些情况。原来，你是1963年十七岁时，以480分的优异成绩（当时只考六门，满分为600分）考入华东师大物理系的一名青年学生，本应于1967年毕业。“文革”时你横遭当局迫害，竟长期留在华东师大，当了十年“待分配学生”。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怕是罕见的独一份！

我们拜访了上海市委书记、市委常委和办公厅主任。你再也不会想到，你活着时也许永远不会见到这些负责同志，如今都很熟悉你的情况。他们谈了为你平反的全过程。你的姨夫起很重要的作用，他多次给北京写信，上海也有许多人支持。为了讨论你的平反问题，市委书记陈国栋苦笑着告诉我，市委常委竟开了十九次会！你感到惊奇吗？判你死刑，扼杀你宝贵生命时，原来的上海市革委会常委会只讨论了短短六分钟！为你平反，为你伸冤，现在的市委常委竟讨论了十九次！每次三小时吧，便有570小时，3420分钟，是6分钟的570倍！古往今来，也难得看到这等奇异的事啊。王申酉同志，你能想得到吗？

上海市委常委会开会十九次，说明意见分歧很大。你不被错杀，这是一致意见。但在如何评价你以及怎样为你平反，争论却很激烈。一种意见是，你是理论上有卓越成就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为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真理而献身，应像宣传张志新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种意见是，你是刻苦学习、好学深思、追求真理的好青年，政治上应当公开平反，但也不必大事张扬。还有一种意见是，你在政治思想上还是有“严重错误”，判死刑是重了，却依然是个“思想犯”！你看这些分歧意见有多大。分歧意见背后，是当今社会各种思想政治力量的较量。

我拿到了市委办公厅铅印的你的《狱中供状》和平反经过。看完你在短短六天中挥笔急书的六万字的《供状》，王申酉同志，我被你在理论上的真知灼见震慑住了。我马上同意第一种意见，认为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已经不是“四人帮”时代，也不是“两个凡是”时代了。那时，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者”的桂冠，仅仅戴在一两个人头上。按照如此荒唐的逻辑，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又怎能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我很气愤而且惊奇。像你这样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那样艰苦条件下尽量收集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剖析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如此透彻地分析、批判“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指导思想方面得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基本吻合的结论。你为什么不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怀着强烈的义愤，我们要求调阅封存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你的所有原始材料。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从法院抱回一大堆。我们几个记者，在康平路一间办公室里，紧张地传阅和摘抄。你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时代写的日记就有八厚本。触目惊心的是，你竟咬破手指，在第一天日记的扉页用鲜血写下立志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那天真而又郑重的誓言。从稚嫩的笔迹到逐渐老练的笔迹，你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学习、劳动、思想、观察和痛苦、惶惑与不安……一一显现在我们面前。日记是你“最忠实的朋友”。你生前不允许他人翻阅，甚至当学院团组织要你“交出日记”便可考虑你入团作为交换条件，你也愤怒地拒绝了。“文革”初期，你的哥哥、弟弟十分担心你的日记会给你带来横祸，竭力劝你烧毁日记，你坚决不肯。多么不幸

啊，这些日记，“四清”时被你同班同学的班长偷偷看了，“文革”中终于被抄走，作为“罪证”展览。你被皮鞭抽打得在满地翻滚，你被抓进监狱……现在，我们看着你这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心灵的记录，怎不感慨万端！你给你心爱的姑娘写的信有十九封，何等惊人的才华洋溢的篇章，有一封谈音乐的信竟洋洋万言。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一个攻读物理专业的大学生，熟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通晓四门外语，竟然对音乐也如此热爱，并写出这样精辟深刻的见解！你的“思想检查”有几十万字，审讯记录有厚厚好几本，还有各种各样的卷宗……

看完这些材料，我感同身受，又愤怒又悲痛。你短促的不幸的一生，便似在我眼前闪过。我似乎看到，天真活泼的你，在给弟弟讲故事，让大家凑出钱来，去买你心爱的一本书。我看到，你一趟趟跑图书馆，夜间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你如此依恋的书。我看到，你以480分（当时满分为600分）的优秀成绩考入华东师大，全家和你是那样地高兴啊！我看到，你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自然科学，立志攀登科学高峰，还广泛阅读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你常常饥肠辘辘，还要从少得可怜的助学金中，挤出一两块钱给你可怜的父亲。“教育改革”开始了，专业课程和外语教学被大量削减，每周都要花十几小时上政治课，还要下厂劳动。一心攀登科学高峰的你理解，你惶惑不安。你参加“四清”，积极争取入团。你心爱的日记被同学偷看，政治辅导员胁迫你交出日记，才考虑你入团问题。你愤怒而又伤心地拒绝了。“文革”风暴开始不久，你便科学地预言，这是一场“灾难”，“将使中国倒退至少十年！”这是多么难得的犀利见解啊。但你还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和同学一起到了北京，想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却被从队伍中赶了出去。你躲在空荡荡的教室，学习第二外语——英语。灾祸从天而降，你被抄家，被打得死去活来，被关进牢房。你在牢房又学了第三门外语——德语。放出后留校监督劳动。

你在“五七”干校，不准你再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专业。你转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资本论》照亮了你的眼睛。你的世界观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哦，王申酉同志，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你在那堆放农具的杂乱的房子里，孜孜不倦地啃着一部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你踽踽独行在南京路上，春节期间你无家可归啊。一次又一次的劳改、释放，没有消磨掉你的意志，你砥炼得更坚强了，因为你具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你愤怒，周总理的逝世使你悲痛万分。你一个人徘徊在人民广场，夜不成寐，又几次从梦中哭醒过来。天安门事件使你振奋，你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不久，一位身材颀长、面容姣美的姑娘悄然走进你的生活。她理解你，同情你，不因为你是个“政治嫌疑犯”而歧视你，躲开你。相反，她钦佩你的学识，爱慕你的才华，崇敬你的品格。短短两个多月，你给他写了十九封热情洋溢、文笔优美的情书。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情书，有的如政论般雄辩，尽情倾吐你的世界观和政治观；有的表述你对音乐、文艺的见解。当然也有不少对姑娘爱慕的深情流露。但是，可悲而又可憎的是，万能的保卫科放不过你，居然到姑娘做工的工厂破坏你的名誉，说你是什么“政治上反动，五毒俱全”的“危险分子”。姑娘害怕了，畏缩了。你毅然退回姑娘给你的信，收回自己的信，准备抛舍那一度曾使你如此幸福而现在不得不放弃的爱情。你胸怀坦荡，不愿使姑娘与你分手时对你留下误解，你要写一封全面阐述你的世界观特别是政治观点的长信给姑娘，约定时间交给他。你正在写信，不幸赶上“伟大领袖”逝世。一直奉命在暗中监视你的工人肆无忌惮地抢去了纯属你私人的信件，作为“罪证”！你再一次被关进牢房。

我们看了关押你的牢房。不到十平方米的囚室，要关押十几名犯人。你在牢房仍孜孜不倦阅读随身带来的几本马列著作。你写信要求父母再给你多捎来一些马列书籍，这个完全正当的要求也遭到拒绝。“四人帮”粉碎了，你欣喜若狂，以为苦难终于到了尽头。你满心希望而且相信，能把你的学识，你的才能奉献给你心爱的祖国。你不止一次遥望铁窗外的天空……

万万没想到，在“两个凡是”指挥下的专政机器，正在无情地运转……一次次提审，你坦然回答，并在六天内写出六万字的《供状》。我来到你书写《供状》的地方。一张三屉桌靠窗放

着，窗外是两株榆树和一丛月季。如今榆树苍翠欲滴，娇艳的月季盛开。它们都是你书写《供状》的见证！可惜它们现在生机勃勃，而你却永远离开人间！

我们来到“公审”你的普陀区体育场，遥想三年前大雨如注，你被押进会场，猛然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无情判决！你怎能想到如此致命的判决。不容你张口说话，你被立即押上“囚车”，立即开赴刑场。我们坐着吉普车，从会场赶到刑场，路上只花了三十分钟时间。这也就是你生前走过的最后一段路程的时间。刑场原是靶场。陪我们来的有当时执刑的刑警。他木然指了你最后站立的地方，又取出行刑时用的手枪，还给我们看了你中弹后的照片。啊，那真的是惨不忍睹啊！

哦，在法院卷宗中，还保存着你考入大学时的准考证，上面有你一张小小的照片。你五官端正，清秀的充满稚气的眼睛天真地看着我们。此刻，那张行刑的照片，只见你血肉模糊，圆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你是在向天空、向大地、向生你养你的祖国和人间惨痛地质问：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访问法院和公安局的同志，此时他们目光呆滞，面部毫无表情。他们声称是：“奉命拘捕”、“奉命审讯”、“奉命判决”、“奉命行刑”！确也如此，专政机器，向来是奉命行事，哪有什么司法独立？

我们和你的哥哥、弟弟、姨夫谈了话，到医院看了你中风瘫痪的父亲，到西藏中路你家中看了至今还不知道你死刑的你可怜的母亲。那低矮的阁楼，是你的住处。我看到你十次抄家后残留的一百多本书和好几本外语辞典。你短短的一生，究竟看了多少书啊！

我们和你的女朋友谈了话。她流着泪，讲了和你相识、相爱以至痛苦地分手的经过。风雨中，她带我们到虹口公园。她讲了和你唯一的一次逛公园的情景。你们在鲁迅墓前坐了很久，你给她讲了鲁迅伟大的一生。她在你“坐牢”时偷偷到你家中去看过你母亲，求你母亲原谅她伤害了你。这能怪她吗？我想，你早就原谅了她。她奉“父母之命”又重新结婚，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她箱底至今珍藏着你的照片，她深深地苦苦地怀念着你。

我们还和在困难中帮你借书又遭到诬陷的那位善良的中年女工谈话。她文化不高，至今还牢牢记得你对她讲过的歌德的名言。

我们再次仔细地翻阅法院卷宗，又看了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常委讨论五十多个判决死刑案件的记录。真是杀气腾腾，平均六分钟讨论一个案子，不住的“杀”、“杀”、“杀”！粉碎“四人帮”时，全国一片欢腾。我们高兴得真是太早了。我们怎能想到，半年之后，中国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我在华东师大采访，下雨路滑，摔了一跤。刚从医院包扎出来，又被一辆自行车撞翻在地，扭伤了腰。一起采访的同行好心劝我回北京治疗。我咬咬牙，挺住了。我们一起商量的提纲，分头写了草稿。

回到北京，我拜访了当时原定“死缓”而后来却被他改为“死刑，立即执行”的原上海市法院院长。他的脸色很难看，看来心情沉重。他把他的“检讨”给我看了，还流了泪。他承认，由于他的“私心杂念”，害怕被看作“右倾”，把对你的判决“升级”了！公平一点讲，不能全怪他。我查了会议记录，在会上“升级”的有十几个。即使他不报，你也可能在会上讨论时“升级”。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几个人一句话，便能打开“地狱之门”。法制、良心、良知统统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政治态度和立场的坚定”！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初稿，打了小样，送给中央主管宣传的负责同志。他对我客客气气地说：“大作拜读了，写得有感情。不要公开发表了吧，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吧。哈哈！”一声“哈哈”，我写的文章和你一样，也被判了“死刑”！

在我一生中，因各种各样原因，稿子被“枪毙”的不少。但听到这样的回答，还是第一次。“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在当代便永无出头之日了吗？

我如此详尽地告诉你这些采访、写作以及稿子的命运，你当然是听不见的了。你泉下有知，也许只会紧皱双眉，默默无言。你早已习惯于这些冷淡的待遇和屈辱的打击！然而，那是“文革”时期和七十年代啊。如今是八十年代的中国。我忘不了你要将你的一生写出来奉献给后来人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在你生前连同你一起被残酷地枪杀了！我有责任实现你血写的嘱托。

过了四年，一九八四年盛暑，我又把稿子改写一遍。我实在放不下它！北京一家出版社把稿子拿走了，表示愿意出版。不幸，这家出版社刚创刊的杂志上，登载了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杂志夭折，出版社负责人作检查。他再也不敢冒风险了。我知道他十分为难，主动把稿子要回来。

稿子，你的《供状》、日记和书信摘抄，又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一躺又是三年。我真的如捏着一团火，愤懑而又不安。偌大中国，难道竟找不到一个地方愿意表表你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篇章？难道真的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王申酉同志啊，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你。

八十年代的中国毕竟不是中世纪的中国。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他们愿意出版这本充满荆棘的小书，而且慨然应允，同时发表你的《供状》和日记、书信摘抄。

我松了一口气。

血的教训是惨痛的。你为什么惨遭枪杀在1977年？采访中，写作中，我一再苦苦思索。中国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长达两千多年，这在世界各国是少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没有深入批判封建主义意识。匆匆忙忙进入社会主义，批判、斗争的锋芒总是对准从来没有占有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封建意识反而在一种“革命”的外衣下泛滥起来。“尊崇皇权”是封建意识的重要部份。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只不过是“封建皇权”的变形。“文革”中有所谓“恶毒攻击”罪。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的阴影笼罩着中国，连同那个“恶毒攻击”罪也照样流行。凡是所谓“恶毒攻击”，就要“狠狠打击，直到杀头，决不手软”！王申酉同志，你死于封建余毒之手，死于“两个凡是”的利剑下！

现在，你的《供状》和日记、书信就要和广大读者见面。（可惜，这些文献至今仍未能和国内读者见面——编注）任何一个不带偏见、有正常头脑的人看了你所写的，了解你的想法，怎样也不能得出你“有罪”的结论。相反，会钦佩你的学识，欣赏你的才华，同情你的遭遇，痛恨和诅咒那扼杀了你年轻生命的封建主义流毒！

今天我们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毫不留情地肃清一切封建主义和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这才能杜绝像你遭到的那种悲剧的重演。

历史上有不少科学先驱，为维护科学的真理而献身。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用火刑活烧死了布鲁诺，因为他坚持和维护哥白尼的地动说，打破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科学的真理

即使遭到火焚、枪杀和种种酷刑，依然禁止不了它的传播。王申西同志，你年轻有为的生命过早地被消灭了，但你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剖析中国社会而产生的许多想法，今天已成为中国的现实。这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

【史海钩沉】

血写的嘱托——王申西和他的《供词》（上）

• 金 凤 •

1977年春天。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江南繁花似锦，万紫千红。人们经过十年漫长的噩梦，刚刚痛饮欢庆十月胜利的美酒，庆祝一个残酷的时代的结束，热切盼望着美好的新的时代的降临。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此刻却在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悲剧。

4月27日下午。天空阴霾密布，瓢泼大雨倒灌似地直浇下来。普陀区体育场上，正在举行从“文革”时期延续下来的“群众公判大会”。黑压压的16000群众，肃立在阴风斜雨中。

一位身穿褪色蓝布学生装、面目清秀端正的青年，双手反铐，被押到会场。他浑身湿透，面色苍白，目光深沉，神态安详。他坦然环视会场，期待命运会对他作出公正的判决。但是，他猛烈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声无情判决，不由得全身震动，炯炯双目喷射出悲愤已极的烈焰。不允许上诉，不容他申辩，他被两名法警紧紧挟持，上了囚车。半小时后，到了刑场。雨停了，天空透出蔚蓝的光辉，地上汪着一洼洼积水。积水中反映着蓝天、白云。他下了囚车，朝前走了十几步，最后几眼看了明净的天空，苍翠的大地，向他这样深情地挚爱着的祖国、亲人和一位可爱的姑娘告别。枪声响处，他凛然倒下，年方31岁。

第二天，两个当工人的弟弟才收到判决书。他们赶到监狱，检点遗物，除了一条破旧的棉被，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几本马列著作。在一本用粗糙的草纸精心包好的恩格斯的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扉页背面，赫然跳入他们眼帘的，是不幸被杀的哥哥用工整的笔迹密密麻麻地写下的一千多字的“本书内容提要”，左下方写有日期：“1977年4月26日”。“1977年4月26日”，这几个普普通通的阿拉伯字母啊，此刻陡然放大，直刺两个弟弟的心胸，他们禁不住热泪盈眶。透过扉页，他们仿佛看到哥哥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还在囚室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思考着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他们欲哭不敢流泪，欲嚎不敢出声，捧着哥哥的绝笔，恰似捧着一颗炽热的跳动的心！

这是怎样的一个青年？他为什么会有这等惨痛的下场？

1980年秋天，我和上海新闻界的几位同行，看了他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日记，看了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监督劳动改造”将近十年所写的“学习总结”、“我的大学生活”等几十份“检讨”和“思想总结”，看了他给女朋友写的十几封倾诉心声、洋洋万言的“情书”，看了他在监牢中写的六万多字的《供词》，看了审讯他的全部记录和判决书。不夸张地说，我们大约看了上百万字的材料。我们访问了他的弟弟、同学、老师、女朋友，拜访了审讯他的公安局和法院的同志，拜访了准备为他平反的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还看了监禁他的监狱和枪

决他的刑场……

我们力图描绘他短促而充实的一生，力图写出他追求真理、为马克思主义献出年轻生命一生。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写下他，是因为他生前曾迫切希望“把我们这一代青年所经历的生活、斗争的一切用笔记下来，告诉我们的后代，使他们在回忆前一辈人的悲剧时，理所当然在珍惜自己的生活，并使生活更美好！”

悲剧的时代扼杀了他的愿望。强烈的责任感使我们怀着悲痛心情勉力实践他的遗言。自然，我们不敢奢望能表达得和他自己一样准确、生动、深刻。下面文中括号所引用的，都来自他的日记、书信和“供词”。

◇ 爱因斯坦的《致后人书》和他的理想

1962年秋天。17岁的少年王申西，以480分的高考成绩（当时，满分为600分）考入上海市著名的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跨入华东师范大校几步，迎面是一条碧波荡漾的小河，两岸垂柳拂面。绿荫深处，是一栋设备完善的教学楼、实验室和藏书几十万册的图书馆。稚气未脱的王申西抑制不住狂喜的心情。从今天起，他就要在这环境优美的重点大学度过有意义的五年大学生活。这对于他这样一个工人子弟来说，是多么幸运和难得！

他的父亲是上海闸北工商联的勤杂工人，母亲是火柴厂的女工。他是他家祖祖辈辈和所有亲戚中的第一个大学生。

解放了，他不再像哥哥一样去当童工，五岁上了小学。小申西是多么喜欢读书啊。只是，他家是个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三个弟弟，九口之家全靠父母每月不到一百元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小申西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有零用钱可以去买自己心爱的书籍。

孩子们久已盼望的春节到了。长辈和亲戚给了申西兄弟一点“压岁钱”。去买诱人的糖果吗？去买更诱人的花炮吗？不，小申西早已想买一本书。光他一个人的“压岁钱”还不够买一本书，怎么办呢？小申西忽闪了一下大眼睛，给弟弟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把弟弟们吸引住了。

“你们说，这个故事好听不好听？”

“好听，好听！”弟弟们拍着小手叫着。

“还要不要听？”小申西故意逗弟弟。

“要，要。”弟弟们叫得更欢了。

“这个故事你们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一本有趣的书中来的。这本书里还有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你们要不要买？”

“要，要！”天真的弟弟终于把他们的“压岁钱”全都交给哥哥，小申西凑足了钱，买了《三毛流浪记》和《小公鸡历险记》，高高兴兴地给弟弟讲起来。

王申西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了。他跟着大人走亲戚，一言不发，只顾坐在一旁看书。姆妈要他烧饭，他捧着本书在炉子旁看着，看着，饭烧焦了也不知道。为了夜里看书不肯熄灯，他不知挨了父母多少骂。可他一有零钱，就买节干电池装上小灯泡，钻进被子里面看书。

他成了黄浦区图书馆的“老读者”。放学回家，放下饭碗，立即上图书馆。他爱看《水浒》、《三国演义》、《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斯巴达克斯》、《烈火金钢》等这些描写英雄人

物的书，特别爱看《牛虻》，他看了将近十遍，几乎可以背出来。牛虻那坚毅如钢的性格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是这样地感动了他，他那时绝对不会知道，他今后一生的命运也将如牛虻那样曲折坎坷。他也爱看关于爱因斯坦、牛顿、居里夫人、哥白尼这些伟大科学家的传记。他钦佩居里夫人把毕生精力献给造福人类的科学事业，他更敬仰哥白尼、布鲁诺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书籍陶冶了他的情操，一点点地铸造着他的性格。1958年8月5日，14岁的少年王申酉咬破指头，用自己的鲜血在他第一本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充满赤子之情的一句话：“永远忠于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

现在，王申酉考进了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踏上通向科学殿堂的第一步，他怎能不异常兴奋呢？他想起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家里整天吃甜菜、南瓜烧粥的艰难日子。现在家境依然艰难。父亲没有零用钱，甚至伸手向他从几元的助学金里借七八角钱。他多少次寻思，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和自己的家庭改变贫困的命运？只有“像科学家一样用孜孜不倦的个人奋斗，以极顽强坚毅的辛劳换取无穷尽的科学成就，一切为了人类的幸福，从而也享受着丰硕的劳动成果（是他所创造的极大财富中极小的有限的一部份）”。他立志在将来“以科学家的身份，将我毕生的精力与才智贡献于全人类，以取得社会对我的信任和报酬”。这个愿望应当说是崇高而又实际的。

大学的学习紧张而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顽强的努力。他经常泡在图书馆里，两三个星期才回家一次。他住在上海市区，寒暑假也常在学校度过。除了啃他的自然科学，他还大量阅读世界文学名著：莎士比亚的《汉姆莱特》、《奥赛罗》，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斯汤达尔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他还看了老子的《道德经》，墨子的《兼爱》、《非攻》，韩非子的《五蠹》，屈原的《离骚》、《哀郢》，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他还看了许多中外艺术理论书籍：《艺术哲学》、《阿波罗艺术史》、《西洋美术史》、《近世美术思潮论》、《意大利及其艺术》、《法兰西艺术》……可以说，他终日遨游在古今中外知识的海洋里，同学们都叫他“怪人”。他们不明白，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为什么要看这许多文学、艺术和历史书籍呢？”

王申酉说：“一个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而对其他领域一无所知的人，是个盲目的人。我一定要用人类最美好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同寝室的八个同学，他家最穷苦，他生活得最寒酸。但他在精神上比别人充实。他自傲地说：“只要自己光明磊落，就会像石像一样，不必向人低头”！

他最热爱的还是自然科学。1963年8月12日，他的大弟弟接到交大附中的入学通知书。他兴高采烈地接弟弟到华东师大来玩，还用每月仅有的三元助学金给弟弟买了一个日记本、一个活页簿和一支钢笔，鼓励弟弟好好学习：“蒸汽机的发明是个伟大的革命，它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现在世界已进入电子时代，不掌握科学知识，怎么建设祖国呢？”

1963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上抄了世界著名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38年8月10日写给五千年后人们的一封信的书简：《致后人书》。这封信是爱因斯坦在1938年10月派人投入纽约东北郊的费来辛草场深井中，用水泥封固的。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这封不寻常的信显然异常地牵动了王申酉的情思，他一字不差地抄在他的日记上：

“我们的时代富于创造思想。我们的发现本应该可以大大地使我们的生活轻松愉快。我们利用电能横渡大洋。我们使用电能来减轻人类的烦重的体力劳动。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利用电波很容易地把消息传递到全球各处。

“但是，虽然有着这一切，我们的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是完全无组织的。人们必需生活在忧患中，担心被从经济生活中抛出，失去一切。除此之外，生活在不同国家中的人们每隔一个长短不等的时间，就要进行互相杀戮。因此，每一个想到未来的人必然都生活在经常的惶恐中。

“我相信，我们的后人将怀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读上面这几字吧。”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38年8月10日”

这位科学巨人概括了20世纪人类的主要成就，也概括了主要的社会问题。王申酉想，五千年后，人们一定会耻笑我们今天的无知和愚昧。这封信引导他开始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生。

他当然不会脱离今天的现实。

1964年4月16日午夜。王申酉躺在床上收听自己组装的一个矿石收音机。突然，无线电传来一个震动世界的消息：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王申酉激动得在心中高呼：“中国这条东方巨龙真正腾起来了！”他满怀希望、勤奋地学习着，学习着，准备将他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科学事业。

◇ 晴朗的天空飘来乌云

1964年，校园中读书声渐渐少了。从北京传来“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声音。华东师大和全国不少大学一样搞起了“教学改革”。学生一会儿下厂劳动，一会儿推粪车，倒马桶……课程几乎被砍掉一半，理论力学被砍掉，第二外语被砍掉，连英语过关考也取消。“毛选”学习增加到每周十小时，星期五和星期六下午全被政治学习占用。甚至连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下午也不放过，不是政治学习，便是体力劳动。一个学生已不能保证每天八小时的专业学习。

王申酉思前想后，实在想不通。这样做，对系统的完整的不容间断的科学知识的掌握有什么好处？“不要读书，不要科学，还搞什么建设？中国如此会被引向繁荣富强吗？”王申酉十分苦恼。

一天，他参观了上海市著名劳动模范王林鹤所在的工厂。他很钦佩王林鹤的成就。但他马上想到，王林鹤试验高压电桥失败的次数太多，不就是因为文化太低吃了亏，才在30岁上了科技大学？！他不明白，让学生多钻一些业务知识有什么不好？“学习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工人阶级的大事呀”，这个工人阶级的儿子在心里也在日记本上大声疾呼：“要有一颗火热的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心，就要有一百分之一百的懂，而不允许有一万分之一的不懂！”

然而，他不能说出声来。“白专道路”的棍子随时随地都可能劈头打下。他只能在1964年的日记中偷偷倾诉：“自从‘教学改革’以来，教学搞得一塌糊涂，倒退了好几年，学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本学期学的东西，不夸张地说，如果省去浪费的时间，一个月可以学会。学习效率远不如一二年级学的深度、广度，实在叫人心酸。大学五年，学到的是啥东西呢？总算感谢上帝，教学改革来晚了两年。如果早来二年，那我五年大学几乎等于白念了。”他沉痛地写道：“我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我不能不为中华民族担心，担心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的衰灭。”他仿佛预感到自己今后的不幸命运，然而，诚实无畏的青年王申酉仍然坦然直书：“我个人也许因这本日记落到他人手中而去劳动教养，甚至送牢狱，甚至上断头台，都不要紧。但中华民族的后退使我不能瞑目！”

不久，他终因不安心工厂劳动受到严厉的批评，被迫写了“深刻的”检讨。

他的16岁的侄女写了一封信给他，落到政治辅导员手里，认定这是王申酉在“谈恋爱”，

要他“彻底坦白”。王申酉照实说：“这是我的侄女”。谁知反落下“与16岁的侄女谈恋爱，道德堕落”的“罪名”。难道这是讲老实话的结果？！

为了改变团干部对待他“极其阴沉的面孔”，王申酉主动放弃一个月几元的微薄的助学金，使自己落入十分窘迫的境地。他衣服褴褛，身无分文，寄封信要特地跑卫生科退药瓶，买根针要翻半天抽屉，买份报纸要用邮票垫付，笔记本用草稿纸订，星期天回家来去步行，横穿整个上海市……他的生活如此困难，又失窃衣服，却无人关心、过问。

清晨，晨风吹来，石缝中的小草在阳光中摆动着，滚下一颗颗露珠。高高的白杨树上，翡翠似的几片叶子在颤动。校园依然充满生机，大自然依然率真、美丽。可是，人们却似乎戴着面具，不能相互窥视一下真面目。除每周10小时学习“毛选”，还要每周花半天到一天时间“暴露内心思想”。每周年级会、班会、小组会起码开五六小时，政治生活的旋风将每个人刮得昏头胀脑。王申酉不断提出疑问：“这是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办法吗？”

夜，是宁静的，月光柔和地照着华东师大的校园。银灰色的月光下，王申酉在操场的一角用不很熟练的小提琴奏出迷惘、沉思的旋律。他曾从一些旧报纸杂志中了解到，当时还年幼的他1957年的形势和1958年“大跃进”的情景。他隐隐感觉到，解放后15年的建设方针并不都是正确的，“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调和“反右”、“反右倾”的思想压抑，直接造成以后三年的举国灾害。而现在，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个人崇拜不又是个致命伤吗？他那稚气的眉宇间开始添上忧郁的神色。

1965年秋天。上海郊区崇明岛一个铁木竹农具合作工厂的洪炉车间里，王申酉正和工人一起打铁。汗水不住滴下来湿透他破旧的衣衫。他随学校前来参加学生的“主课”——四清运动，已有三四个月了。艰苦的劳动、繁忙的工作使王申酉忧郁空虚的心灵一时似乎充实起来。他感到他与工人一个心眼，他的家庭和他自己都是“彻底的无产者”。他愿为劳苦大众真正解放贡献自己的一生！

初冬一个夜晚，在昏黄的灯光下，王申酉已是第四次写入团申请书了。好多同学已在四清中入团，王申酉劳动肯干，工作积极。可是，团组织的大门尽管对有些人敞开着，但对他却狭小得像一条缝，入团成为王申酉人生道路上难以跨上去的极高的一步。团组织要求入团的青年经常向组织汇报自己和别人的思想。王申酉偏偏不会！团组织要求入团的青年必须对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特别热情。王申酉却从内心深处讨厌这些，他怎么能入团呢？他只好一人在江边漫步，任凭江水打湿了鞋袜。他披着破棉袄在雨中漫游，任凭雨水打湿了头发。他发疯似地干重活，使自己练就一副硬骨头，敢于傲视压在他身上的困难，学会在压力和困难面前不皱眉头。

工人很喜欢和信任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兄弟。而团组织却对他关紧大门。

政治指导员那一向冷冰冰的目光突然变了，他一次又一次找王申酉谈话，甚至攀着他的肩膀，要他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后来干脆提出，要王申酉把自己多年记的日记“交出来”！王申酉大吃一惊。他把日记当作自己最知心的朋友，记下自己的一切真实思想，从来不把日记给任何人看，包括自己的父母兄弟。他们有什么权利提出这种无理要求？

天真的王申酉哪里知道，他的日记已被人偷看过了。是和他住在一屋的班长干的。他对王申酉每天晚上写日记发生怀疑，趁王申酉不在时偷看了日记，发现王申酉对“教学改革”的不满情绪。“高度的阶级斗争观念”使班干部甚至把王申酉写来代替人名的英文缩写字母怀疑是“反革命小集团”的代号，当天上报系总支和学校党委。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这可是件了不得的“政治事件”。

在“再去搞些材料”的指示下，政治指导员把王申酉支开，两个团支部委员一个望风，一人抄写，偷偷地摘抄了王申酉的日记，送到学校党委。校党委一面指示做王申酉的“思想转化工作”一面派人“外调”，查阅了王申酉的家庭、亲友以及和他接近的中学同学的档案材料，跑了半个多月，没有发现“反革命集团”的任何痕迹。可是，政治指导员并不就此罢休，一次次找王申酉谈话，希望他交出所有的日记，企图从中“突破”什么难以到手的“材料”。这使王申酉十分难堪。他终于决定：宁可不入团，也不交出日记！他觉得不能出卖自己的灵魂。他躺在被子里偷偷地哭了。他不敢放声大哭，只好拼命往被里钻。那些年代我们的“政治工作”竟逼得一个纯洁无辜的青年到走投无路、痛哭失声的地步！而王申酉所如此珍爱的日记，终于成了他一生不幸的种子。

崇明岛的长江边，伸向江中的石堤顶端的一堆乱石上，王申酉眺望着水天相接的远方。头上，阵阵江风把他的头发吹得凌乱。脚下，滔滔江水冲刷着石块，激起层层浪花。天空一片澄碧，远处飘过几片帆影，无数问号像浪花似地在他头脑中起伏：

他参加四清的那个企业，明明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怎么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联呢？

有人“学雷锋”口头上讲得头头是道，看着别人淋雨，却连伞也不肯借一把，这样的“学习”有什么用？

工作队员白天学焦裕禄心情激动，晚上打扑克几乎通宵。工作组员全体出动参加运土劳动，尊敬的班长同志却迳自关在屋里蒙头大睡。他向组织反映，却受到警告，说是“对党离心离德”！难道当面拍马屁才是“同心同德”吗？

打铁工人辛辛苦苦干到半夜12点，一个月只有20来块钱收入。这样贫穷的生活，落后的生活方式，什么时候可以改变呢？

“个人奋斗”会造成对人民的损失，碌碌无为，平凡地度过一生难道不会造成对人民的损失？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吗？……

水波激起的浪花越拍越高，王申酉回头望去，但见江水浩茫，自己的前途也是一片茫茫。他预感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1966年6月2日，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北京大学“六月一日的大字报”。他明白这场斗争将席卷整个文教界，八年前“反右”斗争的声势又将重演，也许将涉及到更大的方面。

他走出小镇，踏进昏暗的夜，坐在一条狭小的木桥上，在昏暗的夜色独自冥想着：

“难道彭真、邓拓、吴晗等人的政治生命消失了？人说我终日忧心忡忡，以为我始终在为个人考虑，我实是忧国忧民。

“中国共产党是在干着一场极其空前、极其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把中国引入一条极其与世界不同的道路！

“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呢？”

20岁的王申酉发出沉重的叹息和思虑重重的疑问。

◇ “中国将倒退至少10年！”

1966年6月23日。王申酉从崇明岛回到华东师大。丽娃河依然波光粼粼，湖边垂柳婆娑，校园景色依然十分秀丽，全校却已停课，一片的混乱和狂热。

他走进物理大楼，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写他心爱的日记，但空间都被大字报塞满了。偌大的师大，不，偌大的中国，似乎成了大字报的天下。他感到一种狂暴的情感在袭击着他的心：“这种大字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使中国富强，难道非要这样办不可吗？”

他坐在宿舍窗前的桌子旁，抬头望出去，只见楼下路边有一群在烈日下锄草的老头子。他们衣服整齐，穿着皮鞋，戴着手表，显然是学校的教授、学者。但他们的衣服从里湿到外，一颗草要锄六七下，时而停下来擦擦汗珠，但又不敢休息。这在过去能想像吗？老教授替学生宿舍打扫卫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王申酉想：“世道要大乱了。在中国历史上，现在这一段将怎样载入史册”？

6月29日，天下起雨来。风雨声敲痛了躺在长风公园亭子里王申酉的心。他默默思索着：“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翻了曾经稳定一时的教育秩序，把中国引向一条迷茫的路。我从内心深处讨厌这场革命。国家、民族的前途越来越渺茫。生为一个热血青年，一腔热血无处可洒。……”

他走进学校图书馆新开辟的“锄草室”。在这里，人们狂热地批判着解放后十七年的“旧世界”。王申酉看了一篇又一篇《燕山夜话》，看了一篇又一篇的“大批判”文章。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提起笔来，在日记上奋笔疾书：“我敢于说说自己发自内心的话。一些别有用心心的批判者，别有用心地拼命咒骂邓拓等人，扣上各种各样帽子，骂出最刻毒的词句，对他们的文章提出难以想像的解释和歪曲原意的引伸。对邓拓等一些人的看法是，我相信他们的文章是与现实密切结合的。无论是邓拓也好，周信芳也好，他们的骨头是硬的，中国很需要有这样的人物。有多少鼠头獐目的人物的心藏着卑鄙的目的，但口是心非，口上拼命吹捧现实，吹捧当今，人云亦云，毫无骨气地盲目崇拜。我相信，‘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恶劣影响是严重弥漫着中国的。报纸上更神化了，什么‘无限敬仰’、‘无限信任’、‘无限崇拜’，为什么不说‘无限迷信’呢？今后将成为什么世道呢？中华民族将是怎样的呢？我，一个21岁的青年，就敢于对现实提出怀疑。我是一个血性青年，不是无聊的应声虫！不是为了上升而昧着良心盲从的人！”他愤然走出“锄草室”。

初夏的深夜，倾盆大雨打得树叶哗哗作响。王申酉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几次下床，披衣倚窗观看雨中夜景。只见对面长风公园前，有几盏夜灯在晃动。难道也有人夜不成寐，冒雨夜游？他渴望与人交谈，探索这场自上而下、人为地发动的“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但是，哪里有自由交流思想的对象和场地？他只能在日记中自我探索：

“这场文化大革命使整个文艺界、文教界、科技界进入了瘫痪阶段，当然也蔓延到其他各界去了。不知道何年何月再走入到稳定的状态，难道就是这样循环下去吗？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58年的‘共产风’不是争了朝夕吗？终身难忘的三年自然灾害味道。父母都是工人，没有什么有权势的亲戚。因而我是硬挺过来的。我记得有一个时期专门吃卷心菜叶子，一个时期专门吃甜菜烧粥，一个时期专门吃南瓜、冬瓜。咸菜豆腐、萝卜干成了珍馐美肴。一次去学校路上啃大饼时，一个40岁左右的壮年汉，竟向我讨吃一点。

那时人就不能不为生存而斗争。这是群众觉悟不高吗？不！是干部觉悟不高吗？不尽是！最根本的还是犯了一个极左的大错。有点良心的的人都是看得见的。有些人说了些真话，功劳再大也被削职为民了。

“本来，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遭受到沉痛打击的他们会永远牢记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在无论下手干什么事时回忆一下这场悲剧，从而作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起点。但是，刚刚从大萧条中苏醒过来，就已经又得意忘形起来了！”

“如果再执迷不悟（看来极可能），那世道将更乱下去，历史将倒退！国家不幸啊！”

王申酉深深痛苦着。

1966年8月4日。华东师大一百多位教授、学者，在校园里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迫吃泥土和毛毛虫……不久，物理系二级教授姚启钧跳楼自杀。王申酉奉命和同学们在师大一村、二村巡逻，防止有人自杀。他整夜坐在历史系教授吴泽家门口，心里暗暗对那些老教授说：“死不得啊，为什么要死呢？”

王申酉十分苦闷。但形势逼人。他不得被卷进这场风暴。他参加了校内的静坐示威，又赶到市委门口，和北京红卫兵一起坐了整整9小时。但班级红卫兵组织却不吸收他这个“红五类”子女。

9月中旬，他和全校同学一起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临出发时，他和几个资产阶级子弟一起被赶出队伍，押回上海。到家后，他的当工人的父亲和母亲连声问他：“你见了毛主席吗？”“你是红卫兵吗？”他无言对答，只能在日记中连写几个“大惭”！“大惭”！他脸色憔悴，知道这场“文化大革命”终有一天要“革”到他头上来。

形势危急。他不得不采取一些自卫措施。他违心地起草了揭发批判原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的长达一百四十多张纸的大字报，一下子轰动全校。多少人围观传抄，还有人印成小册子向全国散发。王申酉内心却十分痛苦。他一向认为常溪萍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好干部。他暗暗决定，只等这场风暴过去，他一定向常溪萍赔礼道歉。可惜，这一善良愿望注定不能实现。常溪萍遭到聂元梓一伙的残酷迫害，已经含冤去世（常溪萍是文革前夕的北大社教工作组成员——编注）。

1967年1月，王申酉参加了上海学生炮打张春桥的正义行动。王申酉这时已看透张春桥是“牺牲了上海许多群众的生命而爬到中央去的政治骗子！”

这一年，全国各地内战，武斗升级，愈来愈乱。一天，王申酉回到家里，拿出报纸上批判爱因斯坦、牛顿的文章，愤慨地对弟弟说：“这样伟大人物，人类最杰出的一部份人竟然受到批判！全世界都不会忘记他们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话锋一转，他直指江青：“这个争风吃醋了十几年的女人发疯般地摧残人类文明，对人类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弟弟害怕得说不出话来。他却坦然地说：“我估计，百分之七十的人希望改变现状，百分之二十的人无所谓，百分之七的人见风使舵，死心塌地的人不超过百分之三！”

又一个春天来到了。热爱大自然的王申酉在最后一阵萧索的朔风中发现柳枝上开始露出一粒粒绿芽，内心抑制不住无限的喜悦，他默默欢呼：“满园春色关不住！不管人世社会怎样，春总是美的，她总不吝惜点缀人间的美！”

恼恨的是这个人间社会啊！学校里有人打派仗，有人谈山海经、吹牛、睡懒觉、下棋、玩牌、谈恋爱，而全国正在大乱。上海市民默默地看着大街上雪片似的“告急”传单，映入眼帘的是斗大的血红的“血”字，外加斑斑点点的血迹，只是当作“外国奇闻”般地看着，交谈着。不过，更引起他们注意的是愈来愈下跌的经济生活、孩子的教育以及远方亲人的安全。

王申酉感到万分的孤独和无聊。他觉得自己是“孤独的人孤独地在孤独的房间里，面对孤独的墙壁孤独地坐着。无聊，无聊，无聊！无聊的人无聊地在无聊的环境里写几个无聊的字。这样无聊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早些回到科学研究的希望落空！整整两年泡到汤里去了！”

他只好一个人默默地看书，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写日记：

“几十万大学生，几百万中学生，近万万小学生在虚度光阴，更有几百万人在消极怠工，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我对这样的政局失去了兴趣。”

“这近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上失去的太多了，我的失去是与社会的失去一致的。国家现在是怎样了呢？中华民族向何处去？”

他焦虑着国家的命运，对当前的现实极度不满：

“十年前划了几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真志士。这一次，历史开了玩笑，几十万当权派（有低到一个小小的里弄干部，有高到国家主席）被戴高帽子，罚跪，肉体折磨。而一帮无赖、流氓、小人反而上了台！”

他的哥哥担心地劝他不要再写日记了，否则要丧失一生的。倔强的诚实的王申酉说：“我冒杀头、开除的可能性写了上面的这些话。谁偷看到向上邀功请赏的话，将是一笔好收入吧。一个无辜的人将被打下去罢了，但千万人是会跟我走的！”

他的话不幸而言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矛头直指千万无辜群众。王申酉被隔离审讯、抄家。他多年节衣缩食购置的几百本书籍和一些无线电零件以及他从14岁开始写的8本日记全被抄走，当作“反革命”的“罪证”。无情的皮鞭打得他满地翻滚，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百个“天地难容”、“天地难容”……华东师大几百个学生被点名，成百名学生被“隔离审查”，30多个学生被迫跳楼自杀！

1968年1月29日，正是春节除夕。王申酉被送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关押在三楼的一间牢房里。同牢的有一位上海外语学院的学生赵贵泉，他们很快成了知己的朋友。王申酉向赵贵泉学德语，赵贵泉向王申酉学英语。王申酉的母亲每月给他送去大量草纸。他们用草纸当课本，互教互学第三门外语。一年零三个月的囚徒生活，王申酉没有白白度过。他掌握了德语的初步知识，还把《毛主席语录》翻成英文。

1969年4月，他被“教育释放”，回校“监督劳动”。他看透了一些野心家在登台表演，决心缩回到自然科学领域中去。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他在认真攻读无线电专业知识，在顽强地恢复俄语学习，自学第四门外语——日语。

在艰难困境中，好学不倦的王申酉热切注视着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关心人类文明的发展。1969年7月中旬，他的大弟弟申荣收到他一封信：

“7月20日晚上，你一定去看看月亮。阿波罗号将第一次载人登月，这真是人类了不起

的成就！”

7月20日，他的弟弟果真看了一刻钟月亮。自然，他凭肉眼，什么也看不出来。

过几天，王申酉又收到哥哥寄来的《参考消息》，上面有阿波罗号载人登上月球的报导。王申酉信上说：“7月20号夜里，我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整个欧洲和美洲高兴到发狂的地步。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真值得庆贺！可悲的是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除了能看到《参考消息》的几百万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思想禁锢到麻木的程度！”

1970年，全国范围内又展开“一打三反”运动。华东师大一名女学生吴美娣看到报纸上“大力提拔革命干部”的社论，情不自禁地在报纸上批上“鱼恋鱼，虾恋虾，乌龟恋的是大王八！”这可不得了，她被当作“反动学生”揪出来批判。王申酉十分同情吴美娣，暗中写了个字条支持她：“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王申酉立即受到工宣队的点名警告和批判：他学习业务是“走白专道路”；他学习外语是“里通外国”！他所有的自然科学书籍，英、德、俄、日文书籍和各种辞典全被没收。他被勒令：不准再看业务和外语书籍，只准努力“学习‘毛选’，好好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王申酉气愤地写了“我的自白”、“大学八年思想小结”和“我头脑里真实想的东西”。他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鲁迅关于学习和掌握人类知识的名言，反复表达了他想学习一点有用知识的愿望。工宣队认定他是“猖狂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一打三反运动”。他被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戴帽子，留校监督教育”。

王申酉所有的同班同学都毕业分配了工作。留校八年的王申酉再次被宣布为“敌人”。

◇ 明灯照亮沉沉的黑夜

苏北大丰干校一年多的流放生活，是王申酉一生中的转折点。

1969年底，中华民族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成千上万座“大学校”——“五·七干校”。数以百万计的“走资派”和“臭老九”们被送到这里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

华东师大此时已改名上海师大，干校办在远离上海几百公里的江苏省大丰县境内的黄海滩上。

1970年11月9日，王申酉被送到这里“监督劳动，接受改造”。

在这里，他要干最重最脏的活，还必须定期向“监管小组”汇报思想。对劳动，王申酉已经习惯了。不管是甬河泥，出猪粪，锄地，插秧，挑粪，挑茅草还是打扫厕所，他都默默地干得又快又好。

除了劳动，王申酉还能做什么呢？干校的生活，是这样的枯燥乏味，连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玩起“争上游”和“工兵掘地雷”这样的游戏。王申酉是连玩的权利也被剥夺的“囚徒”，唯一可以由他自由支配的是思维。思维是最残酷的法西斯专政也难以禁止的。

王申酉的神经中枢在激烈地运行，即使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索：

“为什么我不过希望做一个对社会更有价值的人，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无情的迫害却不断落到我头上？”

“做学生追求点知识，当工人追求点技术，当教师多追求点传授知识，当学者多追求点学术研究，为什么是罪恶？为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

“这个社会事实上存在着那么多的缺陷和阴暗面，为什么每当人们流露出一丝真情实感，无情的批判和打击就随之而来？”

“这个‘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四年，社会动乱，民生凋敝。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出路在哪里？……”

“为什么？”“为什么？”王申酉苦思冥想，找不到答案。

干校有一个图书馆，有不少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很少有人光顾。这些知识分子和干部劳动一天下来，已经精疲力尽。王申酉却到图书馆抄了几乎全部社会科学书籍的目录，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他决心充实自己，发誓要窥视和探索“这个社会的本质”。

王申酉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读书的呢？白天，他更加拼命劳动，避免“监管小组”找他的麻烦。清早，他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在田头一站一个把小时，口中默念着德文单词，他希望能逐步学会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原著。中午，别人都午睡去了，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他也不休息，到阅览室看书。晚上，放下饭碗，他夹着书和笔记本，钻进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里面有不少正在霉烂的土豆，老鼠在地上跑来跑去。

在这间小屋子里，王申酉把烂土豆扔了出去，清理出一席之地，开始攻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攻读《资本论》一至三卷。他埋头读书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和寒冷。他回宿舍睡觉时，常常是半夜时分了。

王申酉从阅读《资本论》这部划时代伟大著作中，获得一生从未有过的巨大精神享受。这部伟大著作对王申酉的世界观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了解到，社会的发展决不是如一团乱麻，也不能凭任何伟人的个人意志去操纵，而是有内在的固有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地分析人历史进程唯一正确的理论。他了解到，任何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东西，如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等，它们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都只能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根源，而不能本末倒置。正是马克思第一次把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提到了与其他一切活动相比具有决定性的高度。在王申酉艰难探索的人生道路上，马克思的著作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多年摸索的黑沉沉的夜。他感到无比兴奋，迷茫的眼光顿时明亮起来，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今变得一目了然，偌大的地球一下子像缩小了许多。他决心要用另一种眼光去考察整个社会。

《资本论》他看了两遍。他还阅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剩余价值学说史》、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列宁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等。即使在回上海休假的时间，他背了一个补了又补的书包，每天都在黄浦区图书馆度过，中午啃几只大饼当午饭。

然而，要真正掌握《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演说，并以此来观察现实世界，必须占有丰富的经济资料。在那个一切与外部世界隔绝、自我封闭的社会里，只

有《参考消息》偶而还透露一点外部世界的信息。但王申酉连《参考消息》也被禁止阅读。他只能偷偷地摘录一些经济资料。

一个初春的夜晚，同宿舍的人都已入睡。王申酉正躲在蚊帐内，在手电筒微弱的光下摘抄着《参考消息》中一些国外经济资料。“监管小组”的人一跃而起，猛扑到他床头，大声喝问：

“王申酉，你在干什么勾当？”

“把东西交出来！”

王申酉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参考消息》被夺走了，枕头内和书架上的书籍、笔记本被抄走了，连塞在枕头芯中的一叠“摘录”也被抄走。

第二天，王申酉被拉到干校的操场上批斗。

“你老实交代，偷看《参考消息》和抄录其中材料，有什么反动目的？”

“我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而收集些材料，没有反动目的。”王申酉平静地回答。

“毛主席著作和规定的六本马列著作你为什么不看，要去看《资本论》？”

“规定的我都看完了。”

“你为什么偷偷地学德文？”

“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我学德文是为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著作。”

“那就是说，你对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马列著作不相信。你这不是怀疑马列主义在中国遭到了篡改吗？你是妄图否定马列主义！”

纲越上越高，帽子越来越大。王申酉以沉默对之，不屑一顾。他站在那里，乾脆默默背起德语单词，任凭他们怒吼。他的“顽固态度”激怒了这些好汉。当天下午，一批大字报刷了出来，给他戴了一顶吓人的帽子：“王申酉学习马列著作是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复辟的规律和理论。”王申酉一笑置之。他这时，已经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面对这一场场批判而面不改色。

这场“风波”加重了王申酉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困难。他被迫转移目标，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和读历史书籍。他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阅读了《哲学史简编》、《哲学史讲演录》、《世界通史》、《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等等。他把全部心思沉浸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停地看啊，抄啊，写啊，几乎忘了他所遭受的残酷迫害、痛苦和歧视。他的学习达到了“发疯的程度”，连干校领导见到他母亲时也说：“那里阅览室的书让他一个人包了”。但他们很难理解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毅力，任人们怎样批判，还是狂热地发疯似地学习。

王申酉深信，人在逆境里，比在顺利的环境更能锻炼意志和品格。他非常喜爱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神曲》中的一节诗：“走你的路，任凭他人去说。你要屹立得像一座坚稳定的塔，它的高顶在狂风中决不动摇。”他决心对一切横逆迫害抱蔑视甚至讥笑的态度，对一切攻击污蔑若一阵微风吹过，毫不在意，最多像讨厌的蛛网一样，随手拂去，从来也不让它们阻挡自己探索真理的步伐。

在干校还有两个所谓“反动学生”小黄和小薛，他们都参加过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坐过监牢，残酷的政治迫害，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使他们消沉、悲观、“看破红尘”，准备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王申酉很不同意他们这种生活态度。但是，他们不敢随便接近。

1971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王申酉和小薛在食堂看书。王申酉看看周围没人，又

到门外看了一下，回到食堂拉了小薛到后门外小河边的草垛旁，开始了他们到干校将近一年后第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月亮被厚厚的乌云遮盖着，小河像一条白色的缎带伸向远方。四周静悄悄的，一只名叫“阿黄”的狗蹲在一旁，似乎代表“监管小组”瞪着眼睛默默地监视着这两个遭受屈辱的大学生。

“谈谈你现在的想法”，王申酉直截了当地说。

“我越来越感到现实社会里没有真理、正义可讲，我再也不搞政治了”小薛沮丧地说。

“不对，马列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不是一团乱麻，是有一定规律的。这就是客观真理，你只要认真去读一下马列著作就会晓得。”

“从牢里关了三年出来，也想充实一下自己。我打算先学好一门外语，同时收集一些解放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料，然后再系统地读点马列的书。”

“不”，王申酉急切地说：“先要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然后再学其他，才会对社会有正确的看法。我过去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一直看无线电方面的书和学习外语。到了干校后，自然科学书不让看，被迫狠下心来学习了马列的一些著作，慢慢地产生了真正的兴趣。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门人类用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作为研究的方法、立场，才能透彻地解释一切现象。现在，我越来越相信，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现实社会总归会按照历史的固有规律变革的。那个不可一世的林彪不是垮台了吗？”王申酉愈说愈兴奋，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林彪虽然垮台，可是”，小薛看看周围，不敢再说下去。他把话题一转，还是转到学习上来：“据说我们这种人是内部控制的，不管你学习马列多么卖力，好心的人也许说你是书呆子，刻毒的人反认为你是别有用心。你在这里不就受到这种批判吗？再说，即使世界观真的变为马列主义的了，又怎样呢？”

王申酉平静在回答：

“我也听说组织上要把我十年、八年地改造下去，这又有什么呢？歌德说过：‘追求伟大事物的人必须全力以赴；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现自己，而规律又能给我以自由。’我追求真理的自由谁也剥夺不了。正因为马列主义在我们这个现实社会被糟塌得不成样子，我们才要学习，才要去弄清怎样被歪曲篡改的。譬如现在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从来没有过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从何复辟？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错误、虚伪的。又如报纸上批唯生产力论的文章，狗屁不通。我如果好写文章，保险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

王申酉见小薛神情紧张，笑了一笑说：“我给你开张书目，你还是认真看点书吧。”

不久，王申酉找小黄也长谈一次，也开了一张书目给他。王申酉对小黄说：

“像你这样的人消沉下去太可惜了，你不要太悲观，把这些书认真读完，一定会振奋起来。我们的处境比当年司马迁的处境好多了，他在那种屈辱的情况下，还写了伟大的《史记》，对中华民族作出杰出的贡献。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为后代作一点事。”

当时，王申酉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除了吃饭，几乎剩不下钱。他还花一角四分钱买了一个练习本送给小黄，在最后一页，特意抄录了青年马克思关于选择职业的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

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

从此，这三个被流放的大学生经常在一起学习马列著作，有机会时还探讨一些社会问题。一天，王申酉和小黄在一起割草。地头休息时，听到干校的高音喇叭在广播：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什么都好办了……王申酉听了，对小黄说：

“这句话不对。要发展中国经济，必定要搞一个工业革命，还要改变现有的经济体制。我想，农村公有制不变，可以按目前的生产队为单位，上交一定的粮食指标，允许生产队用多余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进行自由贸易，各生产队可以竞争，这样农业可以上去。工厂要由厂长、经理负责，进行成本核算，按各厂自己的盈利自定工资、奖金，进行竞争。这样，工业也能上去，一定要重视运用价值规律……”

小黄听了，一言不发。王申酉所设想的，正是当时所批判的。可是，我们写到这里，不能不感到惊异和万分惋惜。王申酉的这些设想（除了他还不肯破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农村和工厂所进行的改革，是多么吻合啊。可是，他是在1971年那个动乱时期提出来的呀！我们难道不钦佩他的真知灼见？！

然而，王申酉为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和解剖现实社会，走的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每月，他只有15元生活费，光吃饭就得花去13元4角。他的工人家庭并没有力量补贴他。他穿的衬衣是从前几批“五·七战士”回上海时丢下的破衣服中捡来的，裤子是弟弟穿破了他拿来补了再穿的（他在坐牢时学得一手好针线活），一件棉袄不知打了多少补丁，床上的被子、被单稍一用力就会撕破。为了购买抄读读书笔记的纸张、墨水和笔尖，他将多次抄家后残存的那些科技、文艺书籍统统送进旧书店。然而，他穷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他一年四季洗冷水澡，赤着双脚劳动，在连续迫害和折磨的逆境中磨炼自己的意志。

他处境的难堪是令人难以想像的。请看他在1972年过春节时的痛苦遭遇。

“文化大革命”的畸形产物——上海师大“五·七干校”，总算照顾民族传统，在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春节放假几天。那些“五·七战士”在熬了那么漫长枯燥的劳动惩罚的苦日子后，一个个兴匆匆地赶回家去和家人团聚，欢度佳节。然而，王申酉回到家里，看到的是生病的父亲和痛苦的母亲，是他们对这个竟在大学泡了十年而不能毕业分配的“不孝儿子”的冷言冷语和白眼。

过春节嘛，一个工人的家庭也总要请些客人来家或到别人家作客。母亲有意说给王申酉听：“家中有这样的宝货，还有脸请人来或到别家去？”王申酉马上表示，春节三天他都在黄埔区图书馆度过，每天保证在晚上8时前不回家，中午午餐自理，晚上8点后回家吃饭。

年初一大清早，这里那里响起了鞭炮声，人们即使在那倒霉的年月也愿意用鞭炮声来表达一点可怜的欢乐，驱逐一年的晦气，祈求来年的幸福！王申酉连这点欢乐也难以分享。他背着一个补了又补的书包，急急地赶到黄埔区图书馆。感谢上帝，图书馆春节没有关门。偌大一个阅览室，只有王申酉一个人。图书馆管理员带着诧异的眼光看着这位“老读者”。

中午，图书馆休息两个半小时。天上正下小雨。王申酉背着书包在马路上溜达，最后走进文化站对面的红星医院。幸亏急诊室没休假，居然找到了化验室的一张椅子。他连忙坐下，心想可以免除冒雨在马路上散步两个半小时的恶运了。不料刚坐下十几分钟，两个保卫干部走来，看到他那副身穿破棉袄、背着破书包的模样，顿起怀疑，立即详细盘问。王申酉一无证件，二又形色匆忙，更不好说出实情，不由得说话支支吾吾。两个保卫干部便拉他一起去派出所说个

明白。王申酉怕拒绝了后果不好，只好破着头皮，随他们到西藏中路派出所。到了这里，王申酉只好说了实话，说到家中不欢迎他回去，他无处可去，才在医院歇脚……他们笑了，王申酉心中却在流血。但怎样证明他的身份呢？王申酉从破书包中寻到一张公费医疗证，他们才算把他放了。他在雨中又淋了半个多钟头，才等到图书馆下午开放。他买了三个大饼，算是压惊和充当大年初一的午餐！

年初二中午，王申酉走进南京路一家饭店。这一天他过得比较“愉快”。营业员看他一个人坐着，又不叫菜，以为他是在等人，没有管他。其实，他望着黑板上写的菜单，心中盘算着，自己交完伙食费后，袋里剩下的钱大概还不够叫一个菜！两点半饭店关门，正好赶上图书馆开门。

第三天，他又找了另一家饭店。

“监管小组”规定他要到学校汇报他怎样度过这几天假期，他没有去。他实在舍不得可以买十个大饼的车钱，他写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汇报。

这是怎样痛苦而屈辱的日子？！王申酉在图书馆中找到了他渴求的书籍，把这些都置之度外了。

在大丰干校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王申酉阅读的马列著作和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大约有几千万字，写了100多万字笔记，还抄了27万字的《世界通史》和厚厚一本《马克思传》。他写钝了十几个钢笔尖，用去十几瓶墨水。

这些数字，难道不是王申酉以惊人的毅力拼命学习马列著作的最好见证？他在一般人难以想像的逆境中刻苦学习，像海绵吸水一样，孜孜不倦地吸收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他从内心深处坚信它的正确性，竭力以它为武器考察一切社会问题。他彻底抛弃了过去那彷徨、动摇、苦闷甚至悲观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对小黄说：

“如果允许的话，我将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